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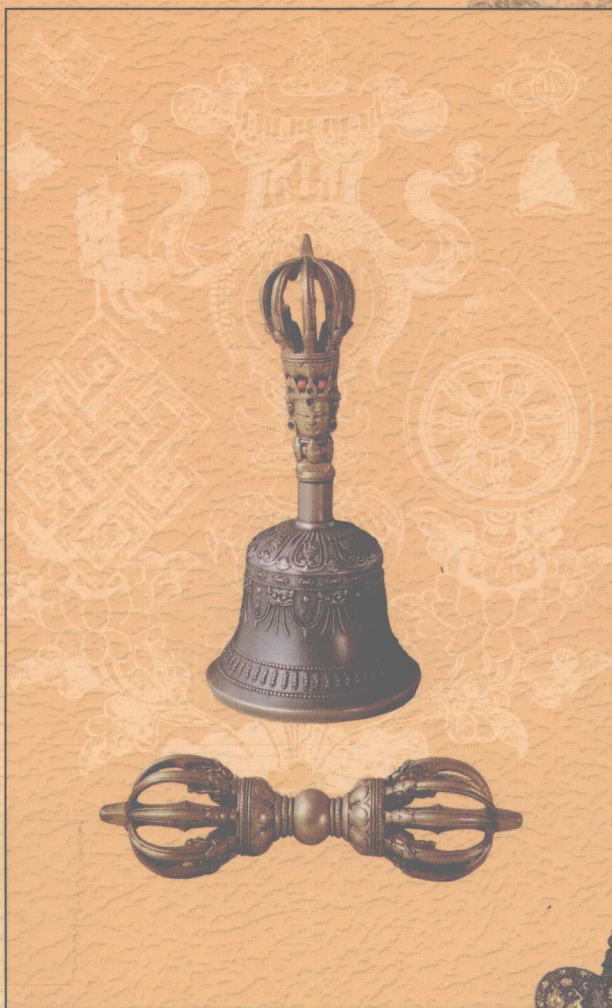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蒙古佛教史

北元时期 (1368-1634)



齐吉◎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佛教史

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齐吉
◎
著

北元时期 (1368-163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佛教史/乔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204-09312-0

I. 蒙… II. 乔… III. 蒙古族—佛教史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041 号

序 言

往昔蒙古人与佛教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随着蒙古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张，蒙古人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外族文化和宗教。蒙古人首次接触佛教似乎是大蒙古国时期。此间佛教从两条途径与蒙古人发生接触，一条是西夏国，另一条是金国。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其邻近的西夏，已经是佛教盛行的国家。西夏人除吸收中原汉地佛教外，也对吐蕃（西藏）佛教兼收并蓄，西夏中期以后更加迅速地从吐蕃佛教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西藏佛教噶玛噶举和萨迦两派在西夏佛教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1205~1227年，是西夏与蒙古通过战争接触的时期。这种接触反映到蒙古人军事和经济领域中。当时西夏人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旋转式野战炮，固定在驼峰上，使其成为机动火炮。蒙古人为使用此炮，从西夏掠夺了很多骆驼。此外，蒙古人还从西夏人那里学到了代表政权权威的令牌和牌符制度，成吉思汗选择宫廷礼乐时，又以西夏音乐为宫廷音乐^①，等等。这些都是蒙古人采用西夏文化的明显例证。

由于与蒙古的频繁交往以及西藏佛教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夏成为西藏

蒙古佛教史

北元时期（1368—1634）

① 《元史》卷六八《礼乐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



文化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当时在西夏活动的西藏僧人北上蒙古草原，开创了西藏与蒙古交往的先河，为后来元朝西藏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藏文史籍《贤哲喜宴》（1564）记载，西藏察巴噶举派的创始人向察巴·尊追扎（1123~1194）的弟子藏巴东库哇^①等七人经过西夏到了大蒙古国，在山间修行，后被蒙古军派充牧羊人。有一次天降冰雹，周围的羊群尽死，只有他因为作法祈祷本尊，所在之处未下冰雹，羊只未损失。蒙古人询问其原因，因言语不同，他使用手指天，因此被蒙古人称为能管天的有福德之人。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听到他的事，立即召见他。他在西夏住过，熟悉西夏情形，衣着又与西夏人一样，所以受到处心积虑要消灭西夏的成吉思汗的重视。藏巴东库哇见到成吉思汗，向他讲述佛经，使成吉思汗对佛教有所了解，但是由于萨满和也里可温的嫉妒，藏巴东库哇离开蒙古回到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最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蒙古军摧毁了许多佛寺，他到成吉思汗身边请求，被成吉思汗尊为“告天长老”，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妻赛因额客（即唆鲁禾帖尼夫人）母子担当他的施主。他还通过翻译向成吉思汗讲说佛教因果关系，劝说成吉思汗信奉佛法，因此成吉思汗发布了免除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驻兵的诏书，还修复了西夏地区的一些寺院。

窝阔台即位后不久，藏巴东库哇去世，临终时遗言要蒙古人迎请他的师兄弟贡塘巴。贡塘巴到蒙古后被蒙古人奉为上师。后来忽必烈一家与察巴噶举派有特殊关系，对察巴噶举派特别敬重。^②

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青海地区有一位叫“斯纳格西”的著名学者。他从西藏带了三位高僧作为随从前往蒙古地区见成吉思汗，在他面前显示了作法降雨，同时让大雨停下来等各种本领，受到成吉思汗的敬重。^③由此可见，大蒙古国时期西藏僧人经过西夏北上蒙古，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并得到蒙古汗廷的敬重，是有根据的。

汉地佛教高僧和通过西夏北上的西藏僧人，究竟谁先与蒙古人接触，其具体年代我们似乎难以解答，然而就现存史料而言，金国的禅宗似乎在

① 东嘎·洛藏赤来校注《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452页注624，说他是贡唐香喇嘛的弟子，最初受西夏的邀请，为西夏王的上师，在西夏弘扬噶举派。

② 《贤哲喜宴》的译文转引自陈庆英文，见《藏学研究论丛》第5期，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50页。

③ 《安多政教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第166~167页。

先，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西夏开创了西藏与蒙古交往的先河，并为后来元朝藏传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国，当时汉地佛教禅宗在宋朝佛教的影响下在金国很盛行。1214年开始，禅宗著名和尚海云法师印简（1202~1257）和其师中观沼公见到蒙古皇子。1219年，海云和其师中观二人，由蒙古的汉军将领史天泽、李守中等举荐，见到了当时在华北的蒙古军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并由木华黎推荐，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告天人”的尊号，并指派他们掌管中原佛教。当时正在启程西征的成吉思汗给木华黎的圣旨中说：“你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教作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尔罕行者。”其中我们觉得有趣的是，成吉思汗将海云等人视为蒙古固有的萨满教的巫师“帖卜·腾格里”（告天人），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指派他们掌管中原佛教之事。当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又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于是海云等从木华黎处得到汉式法号“寂照英悟大师”，“所需皆官给”^①。以上是成吉思汗时期汉地佛教与蒙古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说明汉地佛教与蒙古政权的正式接触似乎是在西藏佛教传入蒙古之前，并且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敬重。1220年中观沼公圆寂。

中观圆寂后，其门徒海云法师个人的活动以及中原地区的佛教，也得到蒙古汗廷的重视和保护。成吉思汗以后，在窝阔台、贵由、蒙哥汗和忽必烈王子时期，海云“为天下禅宗之首”^②，地位更为显赫。

“卯年（1231）十一月受合汗皇帝（窝阔台）宣赐”^③；定宗贵由汗即位后，海云于定宗二年（1247）应太子哈刺赤之请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贵由汗曾“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④；1251年蒙哥汗即位，命“以僧海云掌释教事”。^⑤海云在大蒙古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与汗廷来往密切并主管蒙古汗廷佛教事务的代表人物。

除了海云之外，原在金朝有盛名的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僧人万松行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二，频伽藏本。

② 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六。

③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二，频伽藏本。

④ 同上。

⑤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秀的弟子雪廷富裕(1203~1275),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哈刺和林(kara-qorum)兴国寺。蒙哥汗时期在哈刺和林大建佛寺,以富裕主其事。忽必烈即位后,富裕的地位更加显赫,“命总教门事”。^①看来,13世纪上半期在大蒙古国汗廷,汉地佛教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势力最盛,海云法师和万松行秀的弟子们地位崇高。

除了中原地区以外,西域的一些喇嘛也正在蒙古汗廷活动。据汉文史料记载,有一位喀什米尔的僧人叫那摩。太宗窝阔台时期从西域喀什米尔与其兄一起投奔蒙古,太宗礼遇之,定宗贵由师事那摩。1252年蒙哥汗曾封他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地位高于海云,并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海云就退出了历史舞台。^②

1258年,以蒙哥汗的诏令,由忽必烈召集了佛教与道教的代表人物展开了大辩论。这次辩论,史称“佛道之争”。那摩是当时参加辩论的佛教界居第一位的人物。这场辩论以那摩、八思巴为主要代表的佛家的胜利而告终。那摩等人极力支持汉地佛僧,贬抑道教,使自成吉思汗优礼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以来,道家在汉地的优势大受挫折(详见下文),为日后元朝诸帝信奉佛教奠定了基础。

据《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海云法师传,海云于壬寅年(1242)应忽必烈大王之请到忽必烈宫帐讲述佛法之事。其中有一段记载说:“壬寅忽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师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种种法要,开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王又问:‘三教何教为尊?何法最胜?何人为上?’师曰:‘诸圣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之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将别,王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师曰:‘信心难生,善心难发,今已发生,务要护持……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③从这段记事,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忽必烈对于佛教有了初步的兴趣和信心,产生了信仰的萌芽。忽必烈的宗教活动以及这次与海云谈佛道,不仅与日后中原佛教的兴衰攸关,也是忽必烈后来皈依西藏佛教的重要原因。

① 虞集:《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道园学古录》卷八。

② 关于那摩,《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有其事迹;参见 L.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Rome, 1990, p. 5.

③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大藏经卷四九。

西藏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一般认为肇端于窝阔台汗的第三子阔端（1206~1251）对西藏的军事占领。阔端从1239年开始兵锋转指西藏。1244年旧历八月三十日皇子阔端据其在征服西藏战争中的蒙古指挥官的推荐，向西藏佛教的一支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发出了一份邀请信。通过藏蒙文献，我们都能读到这份“邀请信”的原文，其内容基本一致。阔端之召请萨班，并不表明他对西藏佛教产生了什么信仰，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萨迦派的首领，让他代表各地方势力与自己谈判西藏归顺蒙古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主要目的以外，也有宗教上的原因，就是阔端确实想使萨班到凉州一带起佛教领袖的作用，发展佛教，帮助自己统治原来的西夏故地，因而与阔端的谈判结束后，萨班便留在蒙古地方发展佛教。

藏历火马年（1246）八月萨班到凉州，次年会见阔端。据西藏方面的材料记载，阔端与萨班会见后，“阔端甚喜，谈论了很多教法，在原先黎域（今甘肃裕固县）诸大德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领会了佛教之教义。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今后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祈愿时首先由佛教僧人祈愿。由此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之地位受到重视。”^①从此，萨班成为阔端的上师，并留在蒙古地方“弘扬佛法”。这是蒙古与西藏萨迦派建立的最早的联系。

阔端对西藏萨迦僧人的优宠，引起了起初从汉地佛教禅宗那里接受影响、并且崇信佛教的忽必烈大王的极大兴趣。据西藏《红史》、《汉藏史集》等记载，公元1251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在今甘肃省东部），派人到凉州迎请萨班，当时萨班“因年老未去”。于是萨班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在阔端之子蒙哥都的陪同下，赴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将八思巴留下，与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尊八思巴为上师。

1254年，忽必烈颁给已经继承了萨迦派第五祖的八思巴一份很长的诏书。这就是萨迦派史籍和蒙文佛教文献中常称道的《vja sa bod yig ma》（藏文诏书），当代藏学家们译成《优礼僧人诏书》。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有关蒙古与西藏宗教关系的最早文书。诏书中除了表明忽必烈及其夫人察必都已经接受灌顶，皈依佛法，并尊礼上师八思巴外，还对萨迦派僧人及其寺院作了不受损害之保证。诏书中明确谈到了“汝等僧人已免除兵、



① 《sa-skya gdung-rabs》，北京，1986年，藏文版，125~127页；《萨迦世系史》，拉萨，1989年，汉文版，第85页。



差、税、役”，忽必烈还公开表明“汝等的施主由我任之”。据说，时至今日，萨迦寺的僧人还能流利地背诵这份诏书，可见它对当时的萨迦僧人来说多么重要。

1260年忽必烈即大蒙古国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这样，忽必烈正式确立西藏佛教为国教，以西藏僧人为通领。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元末。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改元为至元，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八思巴领院使。是年又颁给八思巴一道诏书。此诏书在藏蒙文献中以《珍珠诏书》著称。它与十年前的《优礼僧人诏书》不同，是忽必烈以元朝皇帝身份对西藏地区各教派下达的诏书。其内容谈到：治理世道要依成吉思汗的法规，执行佛法要依释迦牟尼的教法；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让其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和佛陀之教法；懂得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服事，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俱不得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劳役；僧人之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之土地、水流、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占夺；僧众要为可汗告天祈福等等。

我们所述这两道诏书都记载了元朝对西藏佛教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尤其后者，指明了蒙古汗廷除了使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形成的“札萨”（法规）之外，同时也使用治理宗教的教法。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道诏书是奠定元朝所执行的“政教并行”原则的最早的蒙古文献。此外，通过这份诏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忽必烈本人与八思巴之间采取了协调世俗君主与宗教领袖关系的可信而有效的办法，也是这道诏书的基本思想。忽必烈将国家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之间划定了明确界限，一经实行，遂成为元朝一代的定制。

1269年，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大法宝王”，另赐玉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更加热情地支持以密宗为主要内容的西藏佛教，其中萨迦派的地位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自八思巴以后，萨迦派的历代领袖多被尊为国师或帝师，许多上层喇嘛相继进入宫廷。

帝师是元代特有的制度，与国师或法师不同。国师和法师，其他朝代的君主也曾颁赐过，是赠给高僧们的一种尊称而已。所以史书说：“元兴，

崇尚释教，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① 帝师居住大都（今北京），而且他的住宅是在皇宫周围的“梅朵热瓦寺”^②。当帝师离开中原地区时必须让别人（当然是西藏萨迦派的）加以替代。据《元史》，从八思巴开始到元末帝师共十二人，其中大约七人是萨迦款氏家族的，有四人是八思巴的弟子门徒。从八思巴到元代所有帝师，都是年轻时期被委任为帝师的，有时甚至十分幼小。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指出：“这一点表明，帝师的候选者在宗教上和心理上的成熟，不是一个必需的要素，也不必是他们的先世师傅的转世。而且，如此的委任，应该是限制严格的一种政治行为。”^③

除了萨迦派以外，与蒙古汗廷关系密切的应是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大概是1255年，噶玛派二世活佛噶玛拔希（1204～1283）得到忽必烈的召见。1256年奉蒙哥汗之召前往哈刺和林，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崇信。元顺帝时，噶玛派三世活佛让迥多吉和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先后到元廷，得到元顺帝的崇信。尤其后者，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解密宗法等等。这一切说明，这一教派自噶玛拔希后，一直和元朝保持联系，只不过其势力不如八思巴的萨迦派罢了。无论萨迦派或噶玛派，当时都注重密宗而不注重显宗，因此西藏佛教之传于元朝者主要是密宗。

纵观蒙元时代西藏佛教在蒙古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佛陀教法，似乎只是上层阶级的信仰，未能深入民间。当时西藏佛教的领袖们主要对蒙古可汗处理国家、教团关系以及可汗本人的宗教信仰施加影响。蒙古人固有的萨满教仍是大多数蒙古人的基本信仰。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和蒙古本土的闭锁，一切外来的宗教都与蒙古社会隔绝。这一事实被后来的蒙古史家称作“无信仰的黑暗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正是佛教徒们的思想观念的反映。元朝佛教振兴时期，蒙古与西藏两个地区由于宗教上的联系而促进了交往，并形成了传统的联系纽带，这一纽带为日后西藏佛教再度传

①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② 关于元朝帝师们居住的“梅朵热瓦寺”，仅见藏文文献，而在汉文文献中我们还查不到其相应的汉文名称。

③ L. Pé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Rome, 1990, p. 37. 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入蒙古奠定了基础。从思想文化角度而言，元朝佛教文化对蒙古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培育了西藏佛教在蒙古地区再度弘扬的土壤。

乔吉

2007年春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序言：往昔蒙古人与佛教	(1)
第一章 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	(1)
第一节 土默特人向青海地区的扩张	(2)
自 1532 年开始阿勒坦汗及其兄衮必里克向青海方面扩张；阿勒坦汗曾先后四次进入青海。	
阿勒坦汗第一次遇见西藏佛教徒；呼图黑台·彻辰·洪台吉出兵西藏，打开了蒙古与西藏信奉同一个宗教之门。	
第二节 阿勒坦汗的佛教信仰起因及其影响	(7)
阿勒坦汗嫡孙把汉那吉突然降明事件；隆庆议和的实	
现；蒙古和明朝和平互市；西藏阿兴喇嘛来到阿勒坦汗宫	
帐；阿兴喇嘛引导阿勒坦汗初入佛门；阿兴喇嘛对“转轮法	
王”和“政教并行”思想理论的恢复。	
第三节 关于“佐格阿兴喇嘛”	(13)
我们所知道的阿兴喇嘛的生平活动；阿兴喇嘛出生地点	
考证。	
第二章 蒙古与明朝之间的佛教关系	(21)
第一节 阿勒坦汗向明朝请求西藏佛经、佛僧	(22)
封疆大臣王崇古的《奏议》，隆庆五年互市以后阿勒坦	
汗向明廷多次请求西藏佛经和传教僧人；明朝向阿勒坦汗发	





送十部佛典和几位西藏喇嘛；西藏喇嘛们在阿勒坦汗身边的各种佛事活动。

第二节 阿勒坦汗向明朝请求蒙文佛经及佛像 (28)

阿勒坦不识西番经和汉文经典，故特请求大鞑靼字番经；明内府经典库遭火灾；明宣宗宣德年的四种文字合璧的经典；甘肃莊浪卫译字官马尼卜刺从甘肃携带蒙文佛经来到阿勒坦汗营地。

从西番新来的喇嘛们；马尼卜刺前往明朝带回番字《金光明经》。

第三节 关于阿勒坦汗建立第一座佛寺及相关问题 (33)

“五彩建寺大青山”；佛寺建成时间及其特点；“所盖城寺”并非“归化城”；美岱召原形；关于呼和浩特。

第三章 蒙古人再度皈依佛教 (46)

第一节 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历史的主要文献 (47)

《阿勒坦汗传》；《三世达赖喇嘛传》；《安多政教史》；其他蒙汉文献等。

第二节 阿勒坦汗迎佛的主动性与三世达赖的神圣性 (50)

迎佛活动的开始；西藏方面关于三世达赖前往蒙古的各种议论；达赖喇嘛向蒙古使臣宣称白哈尔汗向他所传达的佛陀法旨，显示格鲁派领袖人物的神圣性。

蒙藏双方决定在青海湖畔会晤；达赖喇嘛显示其“神奇”活动。

第三节 二百余年后蒙藏关系的新开端——恰布恰庙大会 (55)

土默特人为迎接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恰布恰地方建寺庙；阿勒坦汗的迎佛使团及其庄严的仪式；土虎年五月十五日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恰布恰会见。

呼图黑台·彻辰·洪台吉发表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部“和平宣言”（讲演）；蒙古人第一次出家当僧人；烧毁翁公；三世达赖喇嘛颁布僧人戒律；制订“政教二道”。

第四章 蒙古诸部皈依格鲁派及对其保护 (64)

第一节 西藏三世达赖喇嘛再次蒙古地区之行及其效果 (64)



阿勒坦汗从青海返回土默特，建大召寺；公元1582年阿勒坦汗在其家乡病故；蒙古方面派使臣到西藏邀请达赖喇嘛为阿勒坦汗做法事；三世达赖接受了蒙古地区贵族的邀请，前往蒙古地区，但却缓缓而行，在青海地区停留近两年；1584年秋在火落赤管辖的青海湖畔停留，讲经传法。

途经鄂尔多斯，在呼图黑台·彻辰·洪台吉等人的驻牧地传法；“蒙古四十大部落的白色毡房的首领”鄂尔多斯博硕克图（卜失兔）吉农的接待；鄂尔多斯蒙古皈依佛教。

达赖喇嘛到呼和浩特，为“释迦牟尼庙”开光；为阿勒坦汗遗骸举行火葬仪式；喀喇沁万户之行；喀尔喀部阿巴岱汗前来呼和浩特拜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佛教传入喀尔喀部；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第二节 “黄金家族”出身的四世达赖喇嘛 (72)

达赖喇嘛的遗言——他的转世灵童在蒙古黄金家族中诞生；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的身世；西藏三大寺的高僧前来蒙古核查灵童之真伪；西藏方面的确认。

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兵的护送下前往雪域西藏；到达拉萨；到哲蚌寺和色拉寺担任池巴。

第三节 在蒙古人武力保护下的黄帽僧人们 (78)

年仅二十八岁的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西藏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的矛盾激化；西藏藏巴汗对新兴的格鲁派的镇压；第悉藏巴汗的政权建立；喀尔喀部军队之失败；以格鲁派僧人的请求而青海哆啰土蛮部火落赤军队进藏打败藏巴汗军队，藏巴汗政权的让步；在蒙古人武力保护下黄帽派僧人取得胜利。

迎请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阿王罗桑加措在哲蚌寺坐床——格鲁派的胜利。

第五章 格鲁派诸弘法者和译经师在蒙古地区 (82)

第一节 从雪域来的弘法者 (82)

东科尔呼图克图在土默特和喀尔喀：四世达赖喇嘛派往蒙古地区的三位高僧——东科尔呼图克图永丹嘉措；西宁东科尔寺与东科尔呼图克图简历；东科尔呼图克图跟随阿勒坦





汗前来蒙古地方；达赖喇嘛在蒙古地方的宗教代理人；喀尔喀部之行，他的转世。

迈达里呼图克图在土默特、鄂尔多斯和林丹汗宫廷：迈达里呼图克图十三岁时被迎请到呼和浩特，三世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为迈达里庙（美岱召）的弥勒佛开光及美岱召名称来历；迈达里呼图克图与鄂尔多斯博硕克图吉农父子的关系；在鄂尔多斯的传教活动；林丹汗的供奉喇嘛。

夏尔巴呼图克图与林丹汗。

卓尼大寺的高僧卓尼·曲吉·金巴达吉；维护格鲁派的利益所作的贡献；在蒙古左右翼和卫拉特蒙古的活动；奉为林丹汗的供养喇嘛；与固始汗的关系；圆寂。

第二节 两位神秘而颇负盛名的译经师 (90)

文献所记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参加恰布恰庙会谈的主要人物；跟随阿勒坦前来蒙古地方，被誉为呼和浩特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蒙藏之间的外交活动；蒙译《甘珠尔》经的领导人；佛经翻译活动；《本义必用经》的作者；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萨迦寺喇嘛出身的萨迦·端都布；前来鄂尔多斯居住，与鄂尔多斯博硕克图吉农一家的关系；《西藏王统记》（明鉴）的翻译；《莲花生大师本生传》的绝妙译文；萨迦·端都布的佛学观。

第三节 蒙古地区的主要佛教弘扬者及其译经活动 (106)

格鲁派在蒙古地区传播及其发展进程中阿勒坦汗的决定性作用；恰布恰庙会晤为蒙藏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阿勒坦汗法典；阿勒坦汗组织译经及建寺庙活动。

弘扬佛教活动的重要人物呼图黑台·彻辰·洪台吉——《蒙古源流》记载；明人记载；以佛教观念解释蒙古历史的开创者。

那木岱·楚鲁克·鸿台吉继承汗位；三世达赖喇嘛降旨喻示三条；那木岱汗与钟根哈敦一起安排三世达赖喇嘛的后事，建造舍利塔；与钟根哈敦、不他失礼一同将三世达赖喇嘛的遗骸护送青海；四世达赖喇嘛四岁时迎请到大召寺；向西藏大昭寺及各大寺院的大量布施；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

工作；《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那木岱、钟根哈敦、温布洪台吉的提倡和赞助下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得到全部翻译。

钟根哈敦的名字及其生平；汉籍所记载三娘子及其传记；跟随阿勒坦汗远征卫拉特，归途中生不他失礼；与阿勒坦汗一同赴青海迎请三世达赖喇嘛；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受命翻译《贤愚因缘经》、《妙法白莲花经》等。

温布洪台吉身世及其名字；温布洪台吉等五人统领的五路侦察兵护送四世达赖喇嘛抵拉萨；与那木岱、钟根哈敦一起主持了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的翻译；仿照西藏用珍宝建造不动金刚佛；建造小召寺；与《阿勒坦汗传》的编纂有关系的人物；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受命翻译《米拉日巴道歌》、《宝鬘论》。

第四节 其他佛教弘扬者和译经者…………… (118)

不彦台吉名称及其身世，驻牧地；与蒙古右翼三万户的首领们一起前往青海迎接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二班三千人的率领者；《牛首山授记经》译文考订。

摆要把都儿台吉身世，驻牧地；创建“华严寺”及其现存蒙文碑文。

摆要把都儿台吉亲生儿子出家当喇嘛；史书称其为喇嘛台吉——梵藏汉蒙四体合璧《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编纂者；《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译文跋语纪年考察；《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刊行的佛学意义。

稀见的《金光明经》；翻译《金光明经》缘由；《金光明经》中出现的纪年问题之考察。

第五节 在山洞中修行的僧人们…………… (135)

土默特的修行僧人博格达察罕喇嘛神奇的活动；其晚年修行地方的考察；博格达察罕喇嘛石碑。

博格达察罕喇嘛的“心传弟子”道宝迪彦齐·赤列扎木素；行为及其教戒，获得正悟；约三十年之修行生涯；继承博格达察罕喇嘛法座；博格达察罕喇嘛被追认为广化寺的第一代活佛；道宝迪彦齐·赤列扎木素的四位弟子；五开间的寺庙——最初的广化寺。





继承赤列扎木素法座的吹斯噶巴迪彦齐管理寺庙；创建一座九开间的寺庙；西藏四世班禅额尔德尼赐寺名——广安寺；修行三十年；与西藏高僧们的关系；坐床二十九年。

赤列扎木素的弟子察哈尔迪彦齐；从西藏来到察哈尔的云游僧，在呼和浩特西北山中修行多年；创建庆缘寺。

赤列扎木素的另两个弟子；察汉迪彦齐所建慈寿寺；额尔德尼迪彦齐（班德迪彦齐）所建崇禧寺；在呼和浩特地区宗教活动中出现的特殊现象。

内齐托因生平；从西藏前来呼和浩特地区；在呼和浩特北部山中和漫瀚山洞等地苦修三十五年；拜访诸贤德禅师及招纳弟子；与俄木布洪台吉的关系；俄木布洪台吉事件；离开呼和浩特前往东蒙古。

第六章 西藏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力…………… (148)

第一节 被遗忘的中世纪蒙古人的宗教平等政策…………… (148)

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蒙古帝国的继承者们对宗教的普遍主义和兼容并蓄政策。

第二节 阿勒坦汗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蒙古一般社会的影响…………… (151)

蒙古传统宗教政策的抛弃；以法律形式决定独尊西藏佛教格鲁派。

镇压萨满教活动的开始；格鲁派左右着蒙古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出家僧人的产生及其特权；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 佛教对蒙古地区政权思想的影响…………… (157)

恢复“政教二道”思想根源；“政教二道”与蒙古政权的关系；蒙古地区的“佛教政权”概念；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与蒙古的“政教并行”之不同。

北元时期出现的蒙古诸部“汗”号；土默特部利用佛教而形成的“蒙古政权中心”思想；北元之灭亡。

第七章 佛教对蒙古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165)

第一节 元代佛教文化的余晖及其影响…………… (165)

继承元代译经传统——土默特人的佛经翻译高潮；文化教育的影响；蒙古地区出现格鲁派僧侣阶级——贵族僧侣和